

##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 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稳步提升，服务消费有广阔发展潜力

## 以供需协同促进服务消费提质升级

□ 朱孟晓

高质量发展  
看消费

■2012年至2015年，我国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超越第二产业，确立主导地位。到2024年，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提升至56.7%，呈现稳步提升态势

■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在规模、结构、效益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一方面，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约70%的平均水平，产业结构优化还未达至“稳态”水平，与产业高端化和消费升级化要求不匹配；另一方面，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足40%，而发达国家约为50%，这影响了产业供给质量、效率和效益提升

## 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意义

从供需两侧看，服务业是大型经济体提升竞争力、安全性、韧性和可持续性的重要支撑，同时也为提振消费、促进升级和扩大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持。

服务业发展的主导性和驱动性持续增强。2012年至2015年，我国服务业（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突破50%，超越第二产业，确立主导地位。到2024年，服务业（第三产业）比重提升至56.7%，呈现稳步提升态势。经过多阶段发展，我国经济从快速工业化向服务业主导阶段跃升，实现了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协同升级，形成制造与服务的互促叠加效应。从实践来看，服务业引领创新与变革，日益成为经济主导力量。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的研发应用，进一步驱动服务业升级。当前，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服务融合的核心驱动力，其引擎效应日益凸显，为服务消费领域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强劲动能。比方说，赋能高品质文旅产品创新，推动《哪吒》等动画影片实现市场突破；加速民生服务领域的智能化进程，以养老机器人为代表的服务型机器人前景可期。

服务业需充分发挥其实体经济性和需求创造性功能。毋庸置疑，服务业本质上具有实体经济意义，能够提升供给水平并创造新兴需求。其实体经济性和需求创造性主要体现在生产性、生活性和公共性服务业三大功能。生产性服务业（如研发、金融、技术、物流等）通过支持农业和工业生产，提升产品与服务品质，更好地满足物质性需求。生活性服务业（如餐饮、住宿、家政、旅游、信息等）直接服务于社会与家庭，满足人们的日常便利性需求。公共性服务业（如教育、文化、医疗、养老、环境、社会治理等）则聚焦人力资源开发、社会保障、公共安全和生态优化，满足以人为本的发展性需求，支撑再生产与可持续发展。当前，推动制造与服务融合，加强研发创新、实施城市更新、优化营商环境、繁荣文化旅游生态等举措，成为实践发展和民生需求的重点，也是服务业多重功能的体现。

释放服务业发展效能需加快突破诸多制约。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服务业在规模、结构、效益等方面仍存在明显差距。一方面，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远低于高收入国家约70%的平均水平，产业结构优化还未达至“稳态”水平，与产业高端化和消费升级化要求不匹配；另一方面，



游客在青岛古城景区夜景游玩。（新华社发）

生产性服务业占比不足40%，而发达国家约为50%，这影响了产业供给质量、效率和效益提升。例如，发达国家在研发、技术、品牌等关键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对全球产业链分工具有控制性影响，而我国在这些领域仍有较大差距。当前，发展服务业需重点突破以下瓶颈：一是改变高端服务业供给不足，低端服务业占比过高的格局，强化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满足多样化需求。二是弥补新兴服务业创新与拓展不足，满足新型化、品质化消费需求，提升供给创造需求的能力，挖掘新增长点。三是改善生活性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品质化与创造性发展不足，对接发展性、人本性需求，提高宜居宜业宜人服务水平。

## 对接消费需求推动服务供给

服务业的发展空间和外溢作用主要体现在制造服务、创新服务、人力服务、人文环境服务等领域。在实践中，应推动服务供给与消费需求协同增进的各类实现形态，更好满足增长性、升级性和发展性消费需求，实现供需高效循环。

面向高质化消费需求，促进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制造是服务的重要应用场景，制造服务或者服务型制造是消费服务化牵引的重要体现。当前，制造产业在基础研发、技术应用等前端延伸不足，在市场营销、品牌打造等后端拓展不够，产品与服务价值链在高端增值领域存在短板，消费需求应变能力较弱，在全球化竞争中易受制于人。为此，从服务业角度看，

需充分发展研发支持、技术升级、智能控制、需求响应和市场拓展等服务，深度嵌入制造环节。从制造业角度看，需借助智能工厂、工业互联网和绿色生态服务系统提升现代化水平，推动从单一产品供给向高附加值、解决方案式综合产品延伸。例如，智能家居、数字穿戴等服务就是以产品制造为载体，以服务功能为架构的系统性全能型解决方案，满足了人们对个性化、定制化和智能化服务的需求，成为制造与服务融合的重点发展领域。

面向创新性消费需求，加快科技创新及转化应用服务发展。科技创新供给与转化应用是一个系统化过程，涉及创新源头、中间服务和产业化主体，旨在打通从科研成果到市场化需求的各个环节。这一过程催生了大量服务业新形态，如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概念验证中介、中试孵化及科创金融服务等。服务业须在创新源头、成果转化及市场化应用中发挥多元引擎作用，满足消费端的创新性需求，引领消费升级。

面向服务型消费需求，推动服务业供给提质扩容。随着发展进程，服务型消费占比上升成为消费升级的重要表现。我国城乡居民服务型消费支出增速显著高于总消费支出，服务需求正引领消费增长与升级。然而，我国服务型消费仍有较大发展空间。2022年支出占比约45%，远低于发达国家60%左右的水平，也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约10个百分点。服务业供给需紧密对接服务型消费的重点领域，聚焦技术创新与应用性强、人力资本服务相关性较强以及普惠性服务等方向，推动需求升级。同时，通过融合化发展，培育服务消费新业态、

新模式和新场景，不断丰富、创新和挖掘潜在服务型消费需求。当前，以教育培训、休闲度假、体验经济和银发经济为代表的服务型消费领域，已成为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点方向与增长极。

面向人文消费需求，提升人文生态和文旅服务效能。人文生态和文旅服务经济规模的扩大与升级，满足了精神文明需求、人力资源开发和人才资本积累的需要。作为服务业深化的重要领域，其对改善区域条件、激发市场需求、优化营商环境作用显著，潜力巨大。例如，文化旅游产业生态圈以休闲体验为核心，可融合现代农业、生命健康产业，拓展关联产业，对接绿色化、生态化消费需求；同时提升区域形象，增强活力、展现特色，优化环境，吸引要素集聚，激发消费活力。再如，在AI技术赋能下，文旅服务创新潜力巨大。在文化IP打造、影视制作、康养旅游以及虚拟场景等消费领域开辟了新蓝海，彰显出广阔的市场前景。

## 促进服务业供需高效联动

释放服务型消费潜力，全力推动服务型供给提质增效。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抓住服务业模式创新、生态融合及主导引擎的战略机遇，把握其发展逻辑，提升在实体经济和新质生产力中的地位。推动服务业规范化、专业化、标准化和创新化，创新消费场景供给，强化数字科技与智能设计的应用场景和平台建设。同时，深化教育、医疗、养老等政策密集型服务领域的改革创新，提升消费能力，破解消费抑制问题。

适应需求模式转变，完善制造与服务生态循环机制。在数字化背景下，推动制造与服务围绕核心产品、技术或主导环节，构建显性共生生态系统。加强本地供需对接，提升区域内供应链、产业链的技术经济关联度。适应个性化、定制化消费需求，支持制造主体构建涵盖市场、用户、价值链及商业生态的供给系统，推动服务要素深度嵌入产品供给，持续提升科技化、绿色化、环保型和安全型发展水平。

对接新型消费需求，加强新兴服务业规划引导与政策支持。围绕公共性和生活性服务领域，推动数字创意、文化教育、健康养老、休闲旅游及场景建设等适应消费升级趋势，全生命周期满足人本性、发展性需求。依托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技术，促进平台经济、共享经济、体验经济、创意经济等新业态涌现，拓展生态旅游、人文科技、远程医疗、远程教育、数字穿戴、数字家庭、智慧社区等服务消费新模式。强化财税政策配套，加大支持力度，为新兴服务业提供强有力的政策环境支撑。

以高质化和服务化为核心，支持品牌化打造。供给主体需坚持服务化、终端化理念，提升产品链和服务链地位，推动产品与服务一体化，构筑和放大品牌服务价值。无论是中间产品还是最终产品，供给主体应以服务化为导向，通过品牌化构建以自身产品为核心的供需机制，提升品牌价值占比，推动供需服务化升级。

(作者系山东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 「普职分流」焦虑何解

教育，关系千千万万孩子的前程，牵动千千万万家庭的心弦，始终是全民热点。

从全国两会前舆论场关于“高中双休”的热议，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学位供给”“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等引发广泛讨论，人们始终带着放大镜，寻找教育走向的草蛇灰线。

数据显示，对比2023年，2024年普通高中招生人数从967.8万人增加到1036.2万人，但普通高中招生占比却从约68%降至约64%。同时，2016-2017年出生高峰期的学生，将于2032年前后参加中考，这些都对高中学位提出了扩容要求。

不管从当下还是从长远来看，以学位扩容为突破口，建立“人口-学位”相适应的联动机制，既避免资源浪费，也避免千万万马挤独木桥，是人口、人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学位供给”，无疑是针对社会“普职分流”焦虑最直接的回应。

但实事求是地讲，即使普通高中录取的比例提高了，只要“分流”压力还在，焦虑就仍会存在。再进一步讲，即使中考“分流”压力没有了，压力也会后移至高考，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也不会消失。说到底，人们关心教育，最终指向的还是成才和就业。

所以，“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学位供给”，不应该理解为职业教育不重要了。相反，更应该让职业教育强起来、硬起来，让职业教育成为家长和学生基于成才和就业的主动选择，而不是被迫将就。要切实解决“普职分流”焦虑、就业焦虑，就必须在教育质量上实现“多条腿”走路，弥合多条腿之间的高低差，让教育摆脱“筛选淘汰”的博弈，去提供更多元的选择。

当然，理想与现实间的差距还很大，要改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晋升通道等仍然任重道远。有网友称，“今天老师们鼓励孩子的方式居然是赤裸裸地嘲笑和讽刺蓝领”，如果教育系统内部这种“唯分数论”的评价体系不改变，如果不能从教育系统内部树立“分轨不分层”的基本价值理念，那理想的教育就不会有抵达的那一天。

从科技革命浪潮和国家发展战略来看，教育体系的改变迫在眉睫。在落后追赶时，学习模仿能力非常顶用，但发展到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创新引领能力，当下这种内卷式教育状态就无法再适应发展的需要。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反内卷”逐渐成势，孩子的身心健康问题，社会整体性的教育焦虑，这些困境既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不符，也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要求不符，改变的节点已经到来。

“反内卷”的本质就是放弃同质化无效竞争，发掘自身禀赋特长，转向差异化发展。从这个角度而言，让更多的孩子有机会发掘特长不事无关教育未来，也事关教育公平。

比如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教育部部长怀鹏表示，今年我国将推出“县中振兴行动计划”，把县中作为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重点突破点。从“反内卷”的角度来看，建立更多更公平的成才途径，才有可能打破因循困境。举个例子，如果只有城市的孩子才有机会接触机器人创新实验室，那么县中的孩子就只能继续卷分数，“反内卷”只能成为空中楼阁。

突破“普职分流”所代表的内卷教育，需要整个教育体系的革新。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但当风向已定，风就会越吹越大，我们要做的是顺势启航，至少不应逆风而行。

(作者：熊苗 捞舆工作室出品)

养教结合  
为“夕阳红”添彩

□ 张辉

养老服务体系与老年教育结合发展，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可忽略的话题。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在中央层面面对养老服务作出系统性、总体性、框架性顶层设计，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意见》中明确指出，建立老年教育协同发展机制，依托老年大学等在养老服务机构和社区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老年教育，完善社会力量发展老年教育扶持措施。

老年养教结合强调在老年人的养护中融入教育元素，通过教育促进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社会参与，是一种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有效模式。但应当看到，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老年需求日益多样化，养教结合服务升级迫在眉睫。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2020年山东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2122.1万，占比为20.9%，高出全国水平2.2个百分点，是全国老年人口最多的省份。截至2023年底，山东省60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2391万人，占比达到23.62%，老年人口数量居全国首位。山东省老年人口呈现出总量大、增速快、程度高的特点。我省已采取多项措施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包括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推进医养结合等，特别是在养教结合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尽管山东省已初步构建了省、市、县、乡镇、村五级老年教育办学服务体系，但老年教育仍然相对滞后。大中城市的老年大学普遍面临“报名难”和“一座难求”的问题，而乡镇、街道等基层地区的老年教育设施和水平则相对滞后。相比县级以上城区，基层老年教育经费得不到有效保障，多渠道筹措老年教育经费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同时，优质老年教育资源和师资队伍短缺，难以满足老年人就近学习的需求。而相关养老、涉老机构部门等对老年教育重要性的了解不足、认识不充分，职能部门分工不明确也是养教结合的痛点、堵点和难点。

养教结合，是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关键举措，是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迫切要求，养老服务与老年教育互动发展的新模式，是促进老年人终身发展，建设全民学习型社会的必经之路。目前，养教结合提质升级还有很大潜力和空间。

一是扩大资源供给。积极对接国家老年大学在山东落地办学，并推进山东老年大学做优做特。鼓励、支持普通高等学校、职业学校和社会力量通过多种形式参与老年教育，创新“开放+”“社区+”“互联网+”“融媒体+”“居家+”老年教育模式。二是优化结构布局。大力发展城乡老年教育，将老年教育的增量重点放在基层农村和城市社区，实现县、乡镇、村（社区）三级老年教育网络全覆盖。鼓励开展城乡老年教育对口帮扶，积极推进县域三级老年教育网络建设。三是加强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实施“银龄教师”计划，鼓励“能者为师”行动，鼓励各级各类人才，包括志愿者，投身老年教育工作；支持高等学校加强老年教育相关学科和专业建设，培养老年教育教学和管理人才；加大分类培训力度，提高老年教育专业和服务能力。四是推进数字化发展。把握老年人生活学习特点，对课程资源、教学模式进行适老化改造。推动信息技术与老年教育融合发展，实现“线下组班教学”与“线上自主学习”优势互补。积极对接“全国老年教育课程资源和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网络教育平台的互联互通和学习资源跨区域的共建共享。

老年养教服务无止境。如果简单概括，老年养教服务的提升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最大限度地扩大服务半径，把更多高品质的教育资源送到老人家门口；二是细化老年人的精神需求，采取分众化、沉浸式、个性化服务，提升老有所学的兴趣。比如满足老年人的阅读需求，并不是调大字号、调高音量那么简单，需要做好课程设计、多角度、全方位开展阅读产品和服务的适老化改造。三是定期举办全国老年大学工作会议，加强不同系统老年教育办学单位的沟通交流，互相学习借鉴办学经验，破解制约发展的瓶颈；探索建立老年教育培训机构，面向全国从业人员开展专项培训，提高专业水平和服务能力。

老吾以及人之老，面对老龄化的浪潮，我们要稳稳兜住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让“升温”的需求与“升级”的服务双向奔赴，共同助力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作者系山东开放大学老年教育学院副院长、副教授)

## 用好“银龄”力量助力银发经济

□ 宋佐东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银发经济涉及养老服务、医疗保健、老年教育、文化娱乐等多个领域，老年人是主要消费群体，也是最大受益者。高校银龄人员群体规模大，总体受教育程度高，具有自身的突出优势。如果创造适合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让他们发挥余热，既可继续奉献社会，又能更好实现自身价值，达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高度统一。

## “高校银龄”人员的四大优势

作为知识型老年群体的代表，高校银龄人员具有若干优势，其人力资本再开发对发展银发经济具有战略价值。

一是专技优势。银发经济不同于传统经济形态，覆盖面广、产业链长、业态多元。高校银龄人员不少从事科学研究多年，其相应的专业知识储备和经验积累，可直接转化为服务发展银发经济能力。比如，可发挥专家顾问作用，为老年康养、养老服务技术、老年用品研发等老年相关产业提供发展指导和咨询；可参与银发经济产品研发与服务创新，帮助设计更符合老年人需求的养老产品和服务，推动养老服务和产品升级优化；可为政府、企业发展银发经济提供智库建议、决策咨询；可参与银发经济相关行业协会和社会组织，帮助制定行业标准，指导产业规划，规范市场秩序，促进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等。

二是教培优势。发展银发经济，需要开展相应的职业教育、技能培训。高校银龄人员中很多深耕教育多年，具有相应专长和丰富教育教学经验，善于传授知识和技能，可在教育培训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既可加快培训和培养产品研发、产业经营等人才，壮大银发产业从业队伍，还可参与银发经济科普教育，或利用本人专业，开设各类老年教育兴趣班，为老年教育提供课程和培训服务。

三是引导优势。高校银龄群体社会参与意识强，很多人退休后仍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关注国家发展和社会政策，由于具有高学历、高职称等特点，其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的观点看法，往往能得到更多关注，较易成为一定范围的意见领袖。有调研显示，高校离退休人员参与的社区活动中，老年文化消费意愿平均提升37%。高校银龄人员的引导优势主要体现在：有利于引导社会舆论和观念更新，形成促进银发经济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有利于引导社会投资，提高社会对老年人需求的关注度，吸引更多社会资源投入银发经济领域；有利于引导社会和个人转变养老观念和消费观念，催生更多高端、个性化老年消费产品和服务的出现，促进老年消费市场转型升级。

四是自身优势。高校银龄人员也是银发经济的消费主体，其自身实际感受可以直接影响或反映老年人的需求，同时，对一些基础性服务行业，如老年助餐、居家养老、社区便民等，高校银龄人员可以基于感同身受，提出合理化建

议，更好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多层次、个性化的养老服务和产品需求。高校银龄人员还可为涉老企业改进产品和服务提供反馈，或与企业合作共同研发适合老年人的智能产品，或参与老年产品服务体验与评价，为老年服务行业提供创新思路和解决方案，促进老年用品和服务市场的优化，丰富养老服务场景。

## 推动“高校银龄”人员发挥作用

高校银龄人员能有效弥补银发经济发展中的人才缺口与服务短板，要建立信息与合作平台，构建“政策引导、高校赋能、社会协同、企业参与、银龄行动”的多维体系，推动高校银龄人员在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作用。

一要建立信息平台。制约高校银龄人员作用发挥的因素之一是信息不对称。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平台，个体对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的总体情况把握不全面，而企业或行业也难以将个人的力量整合起来，限制了规模效应的形成。因此要建立老年人需求信息反馈渠道，对于老年用品制造、智慧健康养老、养老金融、旅游服务、适老化改造等产业，要注意听取高校银龄群体的意见建议，以解决老年人急难愁盼为着力点，注重为老年人提供更具个性化、便捷化、高效化的服务，提升其生活品质。要梳理建立高校银龄人员专业特长数据库，同时建立涵盖银发经济市场动态、企业信息、产品服务等信息数据

库，搭建全国性银发人才信息平台，加强高校银龄人员与企业、政府之间的信息交流，畅通与政府、企业间的需求信息渠道，搭建沟通桥梁，实现需求智能匹配，促进供需对接。

二要搭建合作平台。合作平台坚持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和产学研合作的原则。政府部门发挥政策制定和监管作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对参与意愿强的高校银龄人员进行针对性培训，引导支持和帮助他们深入了解银发经济市场的需求和趋势。鼓励各类企业积极加入平台，畅通与高校银龄人员沟通交流，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建立“银色知识产权”交易平台，明确退休人员成果转化收益分成比例。

三要完善评价和激励机制。激励机制不完善，会限制高校银龄人员参与银发经济的动力和积极性。政府要通过荣誉表彰、经济奖励等方式激发高校银龄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比如可试点“学术退休”制度，允许高校教授弹性延长工作年限至70岁；设立“银发经济创新基金”，资助离退休人员创业项目；将银发经济服务纳入高校社会评价体系，对表现突出单位给予资源倾斜。高校要发挥老教授协会、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等的作用，也可成立专门的协会或研究机构，促进资源整合和合作，吸引社会各方资源与高校银龄人员合作，共同推动银发经济的发展。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